

# 简析中英思维方式差异及其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

董召锋

(河南城建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摘要] 早期对比语言学研究几乎都局限于语音系统、词汇语义和结构方面,思维层面的差异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随着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现代的语言对比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纯语言学的研究,而是越来越多地将语言学与语言的文化背景、社会功能、心理机制等联系起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在这种新的研究趋势影响下,本文从思维层面分析了受思维方式影响的汉英语言差异。

[关键词] 英语;汉语;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02(2017)03-0095-04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Whorf)于1941年在《语言与逻辑》(Language and Logic)一文中首先提出“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一词。1945年,查尔斯·弗莱斯(Charles Fries)在《作为外语的英语教学与学习》(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一书中提出对比分析思想。1957年,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对比语言学专著——《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虽然对比语言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19世纪初对巴斯克语、印第安语、埃及语、梵语、日语、汉语、爪哇语的研究,为对比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提出语言左右思维,成为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先驱之一。然而洪堡特在这方面的贡献由于20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盛行,长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新的人文主义学科的出现以及人们对文化的兴趣日渐升温,对比语言学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今天,对比语言学研究已不仅仅关注语言本身,还注重和文化背景、社会功能以及心理机制相关联。在对比语言学研究这一新方向的影响下,本文拟对中英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进行研究。

## 一、理论基础:语言和思想的关系

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历代哲学家,对于现代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人类学家来说也是一道难解的命题。<sup>[1]</sup>有人认为思想决定语言,有人认为语言决定思想,还有人认为思想和语言是相互独立的。在关于语言和思想关系的各种理论中,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说(Linguistic Worldview)和“萨丕尔·沃尔夫设想”(Sapir-Whorf Hypothesis)影响深远,颇具代表性。

洪堡特是把语言知识和哲学思想相结合的第一位欧洲人。他采用一种现在称为“语言世界观”的假说,精确地把语言和思维等同起来。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在 worldview 领域获得了一个新起点。不同人说话方式不同是因为他们思想不同,而思想不同是因为语言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在洪堡特看来,一国的主要特征是其语言,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可在语言中发现,因为语言与一国的精神紧密相连。

[收稿日期] 2016-08-15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英思维方式差异与英汉翻译技巧研究”(2015-GH-517)。

[作者简介] 董召锋(1981-),男,讲师,硕士,从事语言学及文化对比翻译研究。

在语言学中,“萨丕尔·沃尔夫设想”指的是一个人所讲语言的语法范畴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及其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关系。“萨丕尔·沃尔夫设想”有两个要点: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语言决定论是指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看待和思考周围世界的方式。萨皮尔曾在他的书中提到,人类并不是单独地生活在客观世界当中,而是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其所在的社会中作为交际媒介的特定语言的支配。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没有哪两种语言相像到足以代表相同的社会现实。<sup>[2]</sup>语言相对论则认为,一种语言所包含的特性对这种语言来说是独有的,而且语言结构之间的多样性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结构差异越大,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差别就越大。

虽然存在争议,但语言和思想相互联系和作用这一观点确实是为当今诸多学者所接受的,这为我们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至少两种渠道——要么从语言的角度探索它对思维的影响,要么从思维的角度分析它如何影响语言。本文的侧重点则是后者。

## 二、中英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教授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人类面临的某些问题的态度之中。<sup>[3]</sup>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哲学对本族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具有深远影响,相关的文化和哲学背景信息在解释两种语言间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差异时就显得非常重要。

### (一)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的差异在两种语言上的反映

抽象思维就是通过使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来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它要符合逻辑法,因此也被称为逻辑思维。具象思维是通过分析、综合和重制大脑中的记忆表征来形成新的记忆表征的心理过程。表征指的是在看到真正的实物之前,其形象先出现在人们的大脑中。比如说,当我们想起一位熟人时,他/她的外部表征会立刻显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受文化背景的影响,讲英语的人擅于抽象思维,而中国人以具象思维见长。英语语言所反映出的抽象思维是频繁使用抽象名词和介词;而汉语所反映出的具象思维是更多地采用具体名词和栩栩如生的动词。

(1)The signs of the times point to the necessity of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管理体制需要改革,这已越来越清楚了。

(2)The absence of intelligence is an indication of satisfactory development.

没有消息即表明有令人满意的进展。

第一个例子中有三个抽象名词,介词“of”出现了四次,这使得该句子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特别难理解,因为他们要首先弄清楚哪个是修饰语、哪个是被修饰语。相反,带有很多动词而没有介词的汉语翻译会使句子更加清晰易懂。同样的道理,在第二个例子中,“absence”、“intelligence”和“development”的连续使用,使中国读者有一种模糊和间接的感觉,然而对英语读者来说既简短又清晰。

### (二)分析性思维和综合性思维的差异在两种语言上的反映

分析性思维重理性、重分析,善于演绎和推理,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把它们对立起来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综合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一个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及其结构和功能,注重用辩证的方法理解世界,注重和谐对立的统一。<sup>[4]</sup>受不同思维环境的长期影响,西方人高度重视分析、演绎能力的提升,而中国人极为重视综合、归纳等思维方式的培养,表现在语言上则为形合语言和意合语言之分。

英语的句式是形合关系,汉语句式则是典型的意合关系。形合意指从属结构或分句之间有连词的衔接,例如:“如果你不来,我会失望的。”意合通常是指从句、短语或单词间的并列排序没有连词连接。例如:“他笑;她哭。”或者从句镶嵌于主句之中,但没有从属连词连接。例如:“我认为这是真的;有个人想见你。”这两种关系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句法结构的影响:英语国家的人习惯分析性思维,当需要时,他们会使用尽可能多的连词来帮助理解语句间的逻辑关系,直截了当地表明单词、短语或分句间的关系;而中国人重视句子的隐含义,往往会站在全局角度进行思考<sup>[5]</sup>,因此不会使用很多连词来连接句子或分句以达到直接展示逻辑关系的目的。即使句子富含引申义,也常常以逗号连接,而且仍然易于被国人理解。

(3)天好,我去。

It is fine and I will go.

If it is fine, I will go.

Since it is fine, I will go.

When it is fine, I will go.

从上述汉语句子的英文翻译可以清晰地看出,英语句子间的逻辑关系由适当的语法连词清晰地展示出来,而汉语句子间的关系相对隐含。即是说,英语句子是形合的,汉语句子是意合的。

### (三) 客体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差异在两种语言上的反映

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主体和客体未作严格的区分。因此,在汉语中常常用人作句子的主语;相反,英语文化强调客观事物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对主体和客体的区别泾渭分明,表现在语言中即为客体和无灵名词作主语的情况非常常见。

利奇(G. Leech)和斯瓦特维克(J. Svartvik)在《英语交际语法》(*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一书中谈到,英语正式的书面语经常带有客观的风格。也就是说,在正式书面语中,说话者并不直接提到自己或其读者,避免使用代词“我”“你”“我们”。客观语言的一些共同特征是被动态和抽象名词,句子以引导词 it 和抽象名词为开端。<sup>[6]</sup>而汉语常以有生命的名词作主语,充分反映了汉民族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方式。由于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对思维的主体和客体没有进行严格区分,汉语中常会出现一些自动和他动不分的句子。如“一个房间住两个人”也可以说成“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体现了汉语注重意合、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浑融的特点。

#### 1. 聚焦受事:被动语态的使用

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远超汉语,尤其在科普文章中,被动语态以一种更客观的方式陈述事实和信息。夸克(Quirk)等曾提到,在一篇文章当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可能是另一篇的十倍。决定其使用频率的主要文体因素似乎与富含信息量的文章和富有想象力的文章之间的区别相关,而不是与主题的不同或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相关。具有很强信息性及客观性的科普文章或新闻中通常使用被动语态。<sup>[7]</sup>然而如果翻译成汉语,一些被动语态就必须转换成主动语态,以使译文更容易为汉语读者所接受。在《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语法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中,约翰·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列出了被动语态使用的三种场合。<sup>[8]</sup>当事件而不是实施者成为句子的重心,当没有必要提到实施者,当实施者为不确定的某人时,使用被动语态。例如:

(4)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1981.

这本书出版于 1981。

(5) The guest is believed to have arrived in Shanghai.

据说,客人已经到了上海。

虽然汉语中也有被动语态,但并不像英语中那么频繁地使用。只有当行为的发出者无从得知或作者(说话人)不愿提起施事者时,汉语中才使用被动语态。

#### 2. “It”的使用

汉语中,“它”是一个代词;但在英语中,“It”具有其它一些语法功能。在《朗文英语语法》(*Longman English Grammar*)中,亚历山大(L. G. Alexander)列出了“it”作为非人称代词的其它三种用法。<sup>[9]</sup>

一是用来表达时间、距离、天气、气温、环境、潮汐、当前条件等。如:

(6) Time: It's 8 o'clock. 八点了。

(7) Distance: It's 20 miles from London. 离伦敦有 20 英里。

二是当一个非限定动词或小句作主语时,讲英语的人通常用“it”作句子的开头,把非限定动词和小句放后边。在这种情况下,“it”称为形式主语。如:

(8) It's pleasant to lie in the sun. 躺着晒太阳很舒服。

(9) It's a shame that Tom isn't here. 汤姆不在这儿,真遗憾。

三是作为英语强调句的标记。如:

(10) It is Mary who has helped me. 玛丽曾经帮助过我。

在汉语译文中,原文中的“it”必须被省略掉。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将“it”直译,译文将拖沓冗长,不符合汉语语法。

### 3. “无灵主语 + 有灵动词”和“有灵主语 + 有灵动词”

英语惯用“无灵主语 + 有灵动词”的句子结构,而汉语常用“有灵主语 + 有灵动词”的结构。这种不同反映了英语使用者的客观性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幽默特征,同时隐现英语受拉丁语语法影响的痕迹。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曾说,诗歌往往把无生命的东西或抽象的概念拟人化,比如对死神的呼喊,仿佛他是活人一般。<sup>[10]</sup>这些概念的造型艺术的相关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区分语法性别的语言(主要是拉丁语)的影响而形成的。以下例子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英汉两种语言在“无灵主语”和“有灵主语”用法上的差异。

(11) His new book hits off the American temperament with amazing insight.

他在新作中对美国人性格的描写可谓洞察秋毫。

可以看出,英语中“无灵主语 + 有灵动词”结构的使用并不影响思想和观念的准确表达;相反,准确地使用这一结构能够折射出作者对英语语言的熟练掌握及其文学才华。

### 三、结语

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而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因此,架起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桥梁显得异常重要。为更好地理解两种语言在表达方面的差异,本文从中英思维层面进行了对比,讨论了两种语言对比分析的理论基础;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阐释了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说和“萨丕尔·沃尔夫设想”;并基于语言和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影响语言及其表达的。对于学习者而言,要掌握英语,就应该熟知英语的思维方式,对比自己的思维方式,在阅读、写作和翻译中灵活地转换英汉两种思维方式,地道地使用英语。

### [参考文献]

- [1] 胡壮麟. 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7.
- [2] Sapir, 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M]. Ed by David G. Mandelba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185.
- [3] 陈安定. 英汉比较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67.
- [4] 连淑能. 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43.
- [5] 高一虹.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65.
- [6] Leech, G. and Svartvik, J. A Communication Grammar of English[Z]. London: Longman, 1974:217.
- [7]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Z]. London: Longman, 1985:808.
- [8] Sinclair, J.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Z].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313.
- [9] L. G. Alexander. Longman English Grammar[Z].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13:140.
- [10] Jespersen, 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1:219.

### Differenc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Thinking Way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s on the Languages

DONG Zhao - f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Pingdingshan Henan 467036, China)

**Abstract:** In early times, the theoretical bases for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studies were mostly confined to phonetic system, lexical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s of language, the contrasts in thought were not given due atten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 modern contrastive linguistic studies no longer merely focus on the pure study of language. Instead they are carried out in relation to cultural backgrounds, social function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new orient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king ways.

**Key words:** English; Chinese; thinking ways